

时间:3月22日  
地点:上海  
主办方:一席演讲 yixi.tv

讲演者:王小帅 中国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。年少成名,1993年独立制片、编剧、导演的处女作影片《冬春的日子》,被英国BBC选为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之百部最佳影片之一,其后他的电影作品屡屡入选国际三大电影节并多次获奖。

## 四个月时和爸爸妈妈从上海搬进 贵阳 一个山沟沟

大家好,我叫王小帅,出生在上海,就在这个地方,没了。为什么没了呢?因为我叫王小帅这事儿我能比较确定,出生在上海也比较确定,剩下的就好像不太确凿了。

我生在上海,户口上莫名其妙地写着辽宁丹东。父亲青岛人,我在贵阳长大。怎么造成这一切的呢?就是支援三线建设。

我跟这个三线的关系很特殊。我1966年出生之后,母亲的工厂在上海,是一个军工厂,叫上海光学仪器厂,当时跟着三线去了贵州。三线是怎么一回事呢?1960年,中苏关系交恶,北方有上百万苏联军队压过来,这他们说的啊,当时也不知道。到了1962年的时候,中印边境出现冲突,台湾天天唱着反攻大陆,就觉得整个是个包围圈。

1964年8月,发生了北海湾事件,炸弹都落到中国境内了。结合当年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,到重庆就推不进去了,因为重庆的大山里面还保留了一些军工厂,还能因为这个仗提供一些军事设备和基础设施。中印如果打起来,美国几颗原子弹就把工业体系全摧毁了。

毛泽东当时很着急,赶快(把工业体系)往中国的西部转移。那边高山峻岭,可以把工业基地设在那里,为的是好防守。应该是

1964年决定的,1964年8月到1965年4月,大半年的时间,整个工厂一下子就搬过去了。

这里涉及了多少人呢?整个的三线,从云贵川一带,叫西南三线;甘肃、宁夏,叫西北三线,然后从京广铁路往西,长江以南算是二线,沿海是一线,大概有400多万个家庭吧。

400多万个家庭,那个时候一般一个家庭3到4口人,一算的话就是上千万人。我妈妈所在的上海光学仪器厂当时是调了最好的2000多人,直接到贵州。

到那儿部队选址,开着飞机去深山,往下看,这个地方没人,就这儿。好了,领导一下令,下面的人就要往里推进,一边修路一边把器材推进去,开始建设三线。于是一堆上海人,混杂着东北人北京人,空降到这个山沟沟里面,跟周围没有任何交集,自成一体。

我1966年出生,跟上海沾亲带故了4个月,还稀里糊涂呢就上了火车。我妈妈生着病,说不能去了吧也不行。我爸也随着过去了。我爸爸那时在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,他表导系毕业四年,教了八年书。我最近才知道,我父亲竟然在上海待过十几年。

所以我的童年记忆,整个就在那个山沟沟里。

## 十几年后,一家人阴差阳错到了武汉

我成长的过程中,是懵着的。我不能出那个圈子,就知道家长都说上海话,然后你觉得,这是哪儿啊?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人,这是三线的一个巨大特点。三线人出来你问他,你是哪儿人?就懵掉了,回答不上来。有一部分人至今还留在那里,就像三线人说的,献了青春献终身,献了终身献子孙,子子孙孙就这么下去了。

结束以后,三线人再想回家乡,比如北京、上海,就难于上青天,户口档案根本进不来。就算现在属于相对比较自由的迁徙了,可是也回不来了,为什么呢?几十年在那儿了,根都扎在那儿了,一回来亲戚都老了。1976年“文革”结束以后,原来的军工企业改制,变成民营民企,1978年又走市场化道路了。走市场化道路原来国家管的就没了。山沟沟里就很难办了,因为他们生产的每一个东西,所有的成本都比外面贵好多,因为交通费,原材料运进去加工,加工完了再出来,来来回回这个费用,还有时间成本,就使得他们的竞争力没有了。

我有一个同学,一家五口,两个兄弟,一

个妹妹,他们为了保证铁饭碗,就考了技校,“文革”结束以后就接班到了工厂。到工厂正好碰到最糟糕的时候,八十年代末,整个工厂发不出工资,他们就靠着父母的一点点存款,吃劳保。我拍《青红》的时候去看他们,他们就是待着那儿,不敢出去吃饭。几年没发出工资来了。

我们家呢,对我来说很幸运,如果没有命运的小小蝴蝶颤动的翅膀,我们也在那儿。

我爸爸跟我妈妈到山里之后,分到厂工会,坐在办公室里喝茶,领导开会时他就跑过去,给人家把话筒扶好,啾啾啾,好,哦,响了,好,下去坐那儿,领导讲话。

1979年的一天,我爸爸接到一个电话。那天他在家,晚上,工厂的大喇叭叫:“哎,王家驹,快来接电话。”很远呐,要从生活区跑到工厂里。我爸爸想,完了完了,妈妈死了。平时谁打长途电话啊。跑啊跑啊跑,跑到工厂喘了气,好在人家没有挂,电话是他上海的老同学打的,说哎呀,在山里面没事干,武汉军区要排话剧,愿不愿意来?我爸爸说:“好啊。”就去了。

## 毕业时随我挑地儿,我糊涂地放弃了北京

到了武汉以后,作为我个人的,所谓故乡和他乡的困惑真正开始了。因为什么呢?我在贵阳,真的很好,青山绿水,小孩不上学,瞎玩儿。要走的时候,我不同意,跟我爸商量,跟我妈商量,我说你们走吧,我不走,你随便给我搁哪家,我就在这儿。我那时候小,别看我,我有可能成熟得早,有暗恋对象,简直是五迷三道的。

没办法,也得走,我转到武汉大学理工学院附属中学。我心里想:该用什么心态转学过去?不能怂啊,我虽然是贵阳来的,可我是上海人呐!我出生在上海,我上海比你武汉不小。我就,哎,挺着就去了。

那个班人多,乌泱泱几十个人,都戴着眼镜,学习好。我坐最边上紧靠门的位置,门一开就是我,黑板这么看(歪头)。然后我听他们说话就感觉轰隆隆的,听不懂,但能感觉有些议论我。我一直在听,议论我什么?突然有个词儿蹦出来:“乡里伢。”武汉话就是乡下人。我当时醍醐灌顶:我是乡下人!哦,我才明白我跟武汉没关系。于是我就很小心。后来我的性格变成到任何地方自己就在边上,不可能是中间那个人,我永远在边缘待着看。

在武汉混了两年,我以为自己慢慢变成了武汉人,我觉得自己像。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就像格式化一样,我命令自己重新格一遍,把过去的东西全扔掉,重新输入我是武汉人的概念,但很失败。

我学了两年画,考到了北京的中央美院

附中,我要去北京了。

我就问:去北京读书户口要不要过去的?当然,他们说当然要过来咯。我心说这好,我的户口到北京了,我不就成北京人了吗?在北京一待,中央美院附中四年,电影学院四年,都是集体户口。

分配的时候,我这个弦没绷紧你知道吗?我那时学习成绩好,学分总分第一名,但是傻乎乎的。老师说:过来过来,你先挑一下,你是第一名,要抓紧挑哦。现在要你们的就两个地方:八一电影制片厂和福建电影制片厂,你要不要?不要没了吗。

我想没单位我怎么拍电影啊?那个时候拍电影是计划经济,要有厂子,要有厂领导,要有国家指标。所以有的时候啊,人不能在一个过程中过于好,学分高啊,学得好啊,这很难办,你冲在前面人家让你挑,很被动。我没得挑,问我爸,我爸说海边好啊,看渔民,对面就是台湾。二十一二岁啊,傻。一点头,哈哈,王小帅同意去福建咯,户口和档案就到福建去了。我为了神圣的电影事业,就到福建去了。

# 王小帅 身无故土 心有故乡

电影《闯入者》入围「威尼斯国际电影节」主竞赛单元,正在国内热映

## 15分钟内,我逃离福建

福建厂的厂长,叫陈剑雨,《红高粱》的编剧,他专门要我来,有个本子给我,我来了就当导演,我就冲着这本子。结果到那儿待了一年陈剑雨就离开了福建厂。这一错一回,我往那边去,他往这边回,所有的承诺全部泡汤。新领导没给我承诺,你才二十几岁,会拍电影吗?我就傻了,也回不来北京,当时觉得我的人生,完了!

那次经历对我来说影响太大了。从贵阳到北京已经够远的,火车两天两夜。从北京到福建,怎么会三天三夜都在开火车而且不停的?白天吧,还能看到窗外,晚上睡一觉,一睁眼火车还在开,第二天火车还在开。当时就慌了,懵了。我说不行我得跳火车。跟我一起去的凌云说:别别,你干嘛?我说不想去那儿,去那儿就完蛋了,按我家里这么颠簸来来回回,去那儿之后,我就变成福建人了,这事情就落实了。他说没事儿,去那拍电影。我说你是没事。因为他老婆在那儿,他等于是坐三天火车回家,高兴得很。

到福建厂,我觉得只能靠自己改变自己了,就写写写。两年,1990到1992年吧,一直递剧本,厂里面根本就不理你。老劝我在这边你好好好,把家置起来,找个媳妇儿,将来有你机会的。我一想这话就是个陷阱,让我等着,还找个媳妇,让我成福建人。不行,我要警惕。我就在每次发

工资的时候,粮票买好,烟买好,剩下的钱就放枕头底下,一个月一个月攒钱。我想,实在不行就跑。家里东西全是捡的,一切全都临时化。

让我彻底放弃希望的,是北京电影资料馆一个领导到福建厂开会。厂里人全来了。资料馆领导说:你们厂里有一个大学生叫王小帅吧?他学习成绩很好,你们应该让他赶紧拍电影啊,锻炼锻炼,王小帅在吗?我说我在,我正在争取。说得很中肯,我想把话传递到厂长的耳边听,结果被厂长打断了,他说我们这个大学生啊,还年轻,要至少锻炼五年,当场记,当副导演,锻炼五年。

其实在这之前我一直在递各种申请,瞄领导眼色。他始终没表情,我绕着看都看不清楚。到这天突然说,五年!话音未落我就站起来,到三楼我的宿舍,从进屋,到我离开福建,就十五分钟。

厂里人少,都在开会呢。我溜到大街上打了辆车,一屁股坐到车里,那个心,啪,算是塌下来,没人追我回去,从此我就又回了北京,重新找到北京的感觉。

但那时我已经什么都没了,户口、档案在福建呢,我就像个流浪汉,没钱。看着北京,千家万户都是灯,我曾经在这儿十几年,现在,什么都没了,必须靠自己,从头再来。

## 我们家听话一辈子,我决定从此自己做主

我还是琢磨着我的主项,琢磨电影。开始经历了各种顿悟啊,最后,写《冬春的日子》,借点儿钱,开始拍所谓的地下电影,不要什么国家的,也不看领导眼色了。我一直想:我们家从六十年代响应号召,到了那个地方,整个命运就在周转改变,我们一辈子都在听着人家的话,都在忘记自己是谁,没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,但现在,我来吧,让我自己来判断自己吧。

那个时候虽然还是计划经济,还不能自由拍电影,所以拍完之后就把我封杀了,一直到现在,我的身份始终不清,多年以来,我不知道怎么去回应这个事情。所以我的性格,在北京也是,这边一热闹我就搬到远一点的地方去,再一热闹我又搬得远点儿。我现在住四环外,北京再热闹下去我得搬五环去,实在不行搬农村去。就永远躲在外面,我

永远不知道这个世界的中心我可不可以进去。

但这期间我是很尴尬的,非常痛苦,对于一个没有故乡感的人非常痛苦。后来拍电影,想着这个问题,想得越来越多后我觉得,就这样吧,不要再去像大家一样找所谓的根和故乡了。因为我相信像三线这样命运的人和事是非常多的,不光是我。而且把这样的感觉抛掉之后,反而自由了,我就是这样的我,是一个个体,所以我在电影中就潜移默化,下意识越来越主张对个体的关怀,可能是一坨,是一个家乡人,但是每个组成都是一个一个人。

每一个灵魂都是不一样的,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,而每一个生命体都很弱小,都在寻找什么,担忧什么,惧怕什么,我用我的摄影机关心他的同时,也解放了我,使我能够找回我自己。

## 面对现实,我的摄影机 不该缺位

我最近拍了一部电影叫《闯入者》。为什么我拍了《我11》、《青红》之后,还拍《闯入者》呢?为什么絮絮叨叨这么半天呢?就是因为我在拍《闯入者》之前和期间,社会上有个流行的看法叫:忘记过去,忘记过去向前看。对这样的话,我觉得要质疑,要重新思考。因为你怎么可能忘记过去呢?一个人人格的形成和成长,跟过去有丝丝缕缕的联系,斩断过去,怎么可能凭空蹦出来你这个人?国家也是,1965年的大三线建设,后来的文革,其中那种疯狂和非理性主导着这些东西,现在你斩断,我认为不妥。一个国家更需要去面对它曾经过去,不管是犯过的错误,还是取得的成就,都去面对,去总结,以防止未来重犯。

《闯入者》其实就正好说明了这个人的一生到晚年了,实际上他年轻时做过的事情一直在迫随着他,一直萦绕在他的心里,是去不掉的,那就必须面对,把它解决。

其他国家历史的正视和面对,我觉得值得我们思考。其实从我的判断来说,理性对待很多事物是至关重要的,所以我个人现在秉承的是,不随大流,在疯狂之外,保持一点点理性,一点点判断,这是我该做到的,包括做电影也是这样。

我们公司同事说你说这话太重了,他说结束时你编几段心灵鸡汤什么,因为心灵鸡汤大家爱听。我想了半天,不会心灵鸡汤,没有那么深刻。那就回到我自己吧,有人劝我,老想这些事儿干嘛呢?累不累呀?你多拍一些好看好玩的电影,把票房挣好了就完了。可是我想,我是干什么的?我能干什么呀?我不就是一个导演嘛?摄影机在我手上,我面对发生的一切,面对曾经的一切,我怎么能够无视它?怎么能够不把我的权力用上呢?

《闯入者》是去年拍的,当年红红火火的三线是这样的。历史其实没有结束,它还在这里,活生生的,只是人去楼空。里面的女主人公就是坐了一趟火车,从北京到那个地方,像穿越了历史。这东西为什么压我压得那么重?我是掌握摄影机的人,中国的变化,这样的现实,我为什么不表现一下?记录一下?

所以我们的摄影机在当下社会的不缺位是非常重要的。当然,作为娱乐化的工具啊什么,大家很开心地看一些电影,也是必然的,应该的。但于我来说,虽然我身在他乡,我的心里是有故乡的。

我心里这个故乡,它经历的一切,它的痛苦,它的欢乐,包括它现在好的或者糟糕的现实,都有它的未来让我期待。它的美好,一切的一切,我认为我和我的摄影机,都不应该缺位,也不应该缺席。